

# 中国“经济学人”:从理论视角推动中国经济运行发展的时代旗手

## ——写在《2013·经济学人》评选活动揭晓之际

(上接 01)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起步的。从这视角上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创新理论,即成为引导包产到户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指路明灯。在这方面,作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老先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他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相联系对整个三农问题的探究,还尤其表现为给人们从农民土地问题到农民工的整体理论武装。为中国三农改革理论方法、模式给出了总体思路,包括以工业化思维办农业。**经济学家牛凤瑞教授**指出:贫民窟可能是第一代农民工为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支付的成本。过度警惕和防范拉美化现象,可能延误我国城市化应有的进程。

★在对民营经济认定上,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到民营经济成为主体力量的理论武装。

对许多重大问题经济学家们从理论制高点上为民企和广大民众作出解读与引领。从直接意义上说,首先是打破“原罪”说,解决了第一批民营企业老板的最初地位和尊严。其次,民营经济地位从“必要补充”到“两个不动摇”。另一方面,国企抓大放“小”,使相当一部分小国企变成民企。还有国企战略布局调整,让出竞争市场,优化了民企经营环境,十八大之后,终于确立了私有财产也不受侵犯。民营企业,尽管许多地方仍然在缝隙中生存。但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阻隔,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正在逐步消退中。当然,这都亟需经济学家有针对性的及时释疑解惑。

★在对城市化道路认定上,从片面大、中、小之争到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武装。

**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指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率的含义,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它的战略目标和历史意义,在于将中国成功推向高收入国家,实现新兴市场

与发达国家之间更平衡的宏大主题。如何在应对大危机时代全球产业链之重新调整,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发展)再平衡中,以实现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益,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提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战略转型有三大命题。它们分别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增长动力的转型;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落脚点在改革。这几个主要讲第一个命题:这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土地市场化改革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并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效应的放大,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户籍制度的松动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商业的流动,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全球化浪潮和全球产业分工则为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出现了协同效应。城市化中的生产率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

★在开放、走出去、国际化认定上,从WTO到自贸区的理论武装。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的2001年实现WTO之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大手笔,**著名经济学家肖林教授**的重大理论贡献可谓典型代表。他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框架构建,实现更加自由高效便利的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创新:建立以“境内关外”为核心的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模式;以打造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环境为核心的服务贸易制度创新;建立以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外资准入和投资管理制度。

★在金融改革与创新上,从传统金融到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武装。

以建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体系、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宽松可控的外汇管理体制及离岸金融服务体系,同时遵循国际惯例建立相应的金融风险防控制度。

### 三、紧扣中国特色应对改革开放实践,为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

★在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之深层认识把握上,推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

这首次体现在一个其有划时代意义命题上的提出,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便科学地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则是经济学家们多年来探索的共识。首要的一条是市场主体,具有自己特定的产权束,确能以承担相应经营成败(有限)责任为前提和根据;其次是,政府要时刻防止把政府行政变成企业行政,真正起到服务和裁判员作用。第三是形成了没有地方保护,没有行政垄断,体质健全的统一市场体系;第四是能够充分竞争,自由流动,自由进入;第五是对所有公民、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

★在改革、开放总体理论构架下,一个基于特定学派之改革开放总体制度设计的推出。

基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作为新供给学派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教授**,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乃至战略发展、给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这“八双”为: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之“双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之“双化”;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之“双减”;直面国际竞争以扩大对亚非拉开放融和,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之“双扩”;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的“一胎化”管制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制之“双转”;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之“双进”;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之“双到位”;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和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配套改革之“双配套”。

“五并重”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制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演变;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货币战略。

★在转方式、调结构之当下的货币策略上,一个针对三期叠加结构转型特点给出的货币攻略。

金融经济学家们紧密而有机地应对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科学阐明财政、货币等领域一系列公共物品性质、特点,如税费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依据。

探讨调结构期间的总体战略模型,首先要明了什么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叠加”是指当下的中国经济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在这种情势下,相对于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应“防御”,像节能、环保、医疗、住房保障、教育等这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则应“进攻”,要加大投入力度;相应放松融资条件。在这个“三期叠加”时段中货币政策尤应强调这样几个主攻策略:(1)要深入、有效探索降准的适度时机;(2)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3)要积极抓好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回表。同时,要大大支持各种“宝”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融资体制转型。

★在城市化机理给定上,摒弃行政手段,实施基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型城市化运作理论架构。

在城市化机理给定上,一个彻底摒弃行政手段,真正基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型城市化运作理论架构。

经济学家们研究指出:公共物品应当向政府为主转变。21世纪初,我们即提出应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较早指出农村公共物品与城市公共物品具有同一属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应由以农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中国应该选择以大(城市)带小(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同时,针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了重要的新观点。所谓(经济)“发达”核心在资源配置模式、内在机理之优越,在空间机制和形态上就表现为大城市的涌现及其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用户籍制度等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从包括人(作为有价值观导向的生产要素和生活主体本身的人)在内的资源配置视角看问题,亦即不让市场决定,用什么户

籍即行政手段控制一再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总是坚持这个错误呢?越是大城市其资源配置机制越卓越,其业态越先进,其社会聚集效应越高,特别是其微笑曲线机制越优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每增长1%,首位城市人口就会增加0.7%左右。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得世界各国人口和经济产出都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美国大城市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80%和84%;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68.7%的人口和73.6%的GDP。改革开放前,我国用行政手段严格干预和控制人口的流向,违背了人口集聚规律,致使我国城市化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的低水平。造成城乡、工农二元结构问题。显然,把当下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弊端简单地挂勾到大城市上的非资源配置思维是形而上思维。

在国企改革机理再造上,一个旨在机制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演化路径设计理论架构的推出。对国企改革,**经济学家张军教授**从机制民营化视角上为国企改革给出了新的路径。他指出: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策略和方式,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探索中,对国有企业有集体企业民营化的机制等进行了极有深度的理论和经验的系统研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著名企业家宋志平的“央企市营”正好为国企机制民营化改革作了恰当的背书。其实,青岛啤酒、燕京啤酒和长虹电器等等许多国企其崛起不都是靠机制民营化来实现的吗?

★在总体产业体系升级转型上,一个创新三次产业划分理论的推出。

这里要特别要提出的是,主攻第三产业的经济学家**李江帆教授**的理论探索和贡献。他正在深入探索:以服务产品运动为主线构建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

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以严谨的态度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第三产业领域,探讨、概括和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涌现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问题,补充、丰富、发展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透过纷繁复杂的第三产业经济现象,从共有经济规律和特有经济规律两个角度,系统揭示了第三产业和整个三次产业划分运作的经济规律。

■ 成思危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上接 01)

###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刚才林毅夫教授等他们都讲很多了,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账吗?2009年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账,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就是财经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功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我们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这个大家

## 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都知道,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

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分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尽管有GDP。

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

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里7%—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要没有水分的增长,要把这些水分都排除出去的增长,否则你GDP达到10%、12%、13%,那有什么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

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它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个百分点,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个百分点,但投资增长绝对不要只是1个百分点,因为它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但是我们看看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那说明你投资的效益太差了。由于它能拉动GDP的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

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

因为它热衷于去投资,就不热衷于怎么样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它就不重视了。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它挤出了,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这些挑战是不是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是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这个技术创新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以后再创新,我们国家原始创新还不多,数码相机,iPad 颠覆式原始创新还不多,但技术创新还在不断地在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各方面的效率。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我去年和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我们几个人写了一本书,用的克强总理的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一篇文章在第一篇,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资源,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说你结构怎么弄得更合理,结构要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你就要有一种引导他演化的动力和程序。你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它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是对我们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

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我认为它当然是拉动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看,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而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工业化构成里,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又有两方面的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措施,我们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几年以来这种情况没有大大改变;城市居民购买力是农村居民购买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种服务比农村好得多。这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转移农

村劳动力到城市,一方面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这肯定要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虽然它的边际产出虽然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这是它自己创造,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在农村这些低收入人群,这些人转移到城市它的收入能够进一步改善。

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工业劳动生产力相差得很远,我们国家纯农业劳动生产力(种地的种植业劳动生产力)大概每人每年创造的就业增加值是300—500元。我们算过世界十大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档是美国、法国、日本,人均3—5万元;第二大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元;第三档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是300—500元;转移到工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2万元,这在三大国里还算低的,我们大概只有美国的1/8、德国的1/5,但从300—500美元到2万美元这个飞跃是很大的,所以当农民进入城市,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以后,如果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它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大大增加了。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任务。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的办法;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村进城以后,你要解决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它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点非常重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改革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因为解放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分给农

民了,但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了。但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这次三中全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应该是明确了这个问题:

1、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别看它一句话,我在2005年做的建筑法执法检查的时候到过一省,我了解了一下,政府收农民的地是3万元/亩,开发商答应每一家可以有一个人到他那儿来做工,但是政府卖给开发商是40万/亩,这中间有这么大的差价。跟我汇报的时候说农民都很满意,我就不大相信。所以车走到半路我突然想下车,进到农民家里问他们你们满意不满意。他说我这3万很快就用掉了,安排一个工人它有各种条件。所以,这次把农村的集体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样地通过市场来确定,很重要。而且还明确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

2、这次也提出了,要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这也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原来是有承包权的,但承包权不稳固;农民到城市以后,这个承包权就会落空。

3、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应该农民有股份,有分红,转让退出,他到城市里要转让退出。

4、农民的宅基地有用义务权,他可以处置,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解决我们国家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原来农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他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制度创新都会在将来我们会看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刚刚到国外演讲,也是遇到一些人提问题:是不是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我说的是,你们放心,中国经济下行有国际的原因,有国内的原因,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应对这些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这些年来取得的各方面的进步,这点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我说当然,过去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不少的曲折、挑战和险情。但是我相信,在本世纪中叶,不管你们高兴不高兴,中国一定可以成为富强、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抱着这样的信心。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届中国经济峰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